

中国农村调查

(总第63卷·村庄类第17卷·华南区域第9卷)

徐勇 邓大才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农村调查

(总第63卷·村庄类第17卷·华南区域第9卷)

徐勇 邓大才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1、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6年基地重大项目“作为政策和理论依据的深度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16JJD810004）的成果之一。

2、本书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5版中国农村调查”的成果之一。

《中国农村调查》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 勇 邓大才

编 委 (以姓氏笔画排序)

丁 文	马 华	万婷婷	邓大才	王 静
王 勇	王义保	石 挺	卢福营	冯春风
刘义强	刘金海	刘筱红	李华胤	李海金
朱敏杰	任 路	汤晋苏	肖盼晴	何包钢
应小丽	吴晓燕	陆汉文	陈军亚	张大维
张向东	张利明	张晶晶	胡平江	郝亚光
姚锐敏	徐 勇	徐 剑	徐小青	徐增阳
董江爱	黄振华	詹成付	彭正德	熊彩云

本卷编辑整理 李华胤

总 序

2015年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历史上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本院不仅成为完全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目标，特别是进行学术整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调查研究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中国农村调查是基础性工程。从2015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农村调查》便是其主要成果。

学术研究是一个代际接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农村调查是本院的立院之本，兴院之基。本院的农村调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基于项目调查的个案调查（1985~2005年）。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起始于农村改革。延续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后，农村的生产功能由家庭所承担，社会管理功能则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这一问题引起我院学者的关注。1928年出生的张厚安先生是中国政治学恢复以后较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与当时其他政治学学者不同，比较早地关注农村政治问题，并承担了农村基层政权方面的国家研究课题。与此同时，本校其他学者也承担了有关农村政治研究的课题。1988年，这些学者建立起以张厚安先生为主任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由此形成了一个自由结合的学术共同体。

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有其研究宗旨和方法。在学术共同体建立之初，张厚安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的宗旨。“三个面向”是指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是指立足于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这一宗旨对于政治学者是一个全新的使命。政治学研究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传统政治学更多研究的是国家制度和国家统治，以文本为主要研究方法。“三个面向”的宗旨，必然要求方法的改变，这就是进行实地调查。自学术共同体形成开始，实地调查便成为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张厚安先生为领头人的学者就开始进行农村调查。最初是走向农村，进行全国性的广泛调查，主要是面上了解。1995年，在原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由张厚安先生担任主任，由1955年出生的中年学者徐勇教授担任常务副主任。新的中心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但领域有所扩大，并将研究方法凝练为“实际、实证、实验”，更加强调“实”。这种务实的方法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注入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方法。我们的农村调查由面上的了解走向个案调查。年届七旬的张厚安先生亲自带领和参与个案村庄调查，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这一项目在全国东、中、西三个地

区选择了6个重点村和18个对照村进行个案调查，参与调查人员数十人，并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相关人员参与的学术调查研究团队。

第二阶段主要是基于机构调查的全面调查（2005~2015年）。

1999年，国家教育部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启动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建设。当年，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由徐勇教授担任主任。2000年，中心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基地成立之前，以张厚安教授为首的研究人员是一个没有体制性资源保障，纯因个人兴趣而结合的学术共同体，有人坚持下来，也有人离开。成为教育部基地以后，中心仍然坚持调查这一基本方法，并试图体制化。其主要进展是在全国选择了20多家机构作为调研基地，以为全国性调查提供相应的保障，并建立相互合作关系。

作为教育部重点基地，中心是一个有一定资源保障的学术共同体，有固定的编制人员，也有固定的项目经费，条件大为改善，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农村调查根据各人承担的研究项目而开展。这不仅会造成研究人员过分关注项目资源分配，更重要的是造成调查研究的“碎片化”和“片断化”，难以形成整体和持续性的调查。同时，研究人员也会因为理念和风格不同而产生分歧，造成体制性的学术共同体动荡。为了改变调查研究项目体制引起的“碎片化”倾向，2005年，徐勇教授重新规划了基地的发展，提出“百村观察计划”，计划在全国选择100多个村进行为期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调查和跟踪观察。目标是如建立气象观测点一样，能够及时有效地长期观测农村的基本状况及变化走向。这一计划得到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的石挺先生的鼎力支持。2006年，计划得以试行，主要由刘金海副教授具体负责。最初的试点调查村只有6个，后有所扩展。2008年，在试点基础上，由邓大才教授主持，全面落实计划，调查团队根据严格的抽样，确定了200多个村和3000多个农户的调查样本。

“百村观察”是一项大规模和持续性的调查工程，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同时它又是一项公共性的基础工程，人们对其认识有所不同。因为它要求改变项目体制造成的调查“碎片化”和研究“个体化”的工作模式。为此，学术共同体再次发生了有人退出、有人坚持、有人加入的变化。

2009年正式启动的“百村观察计划”，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绩：一是从2009年开始，我们每年都要对样本村和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和形式逐步完善，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调查体系。除了暑假定点调查以外，还扩展到寒假专题调查。每年参与调查的人员达500人左右，并出版了《中国农村调查》等系列著作。二是因为是大规模的调查，可以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调查报告，提供给决策部门，由此也形成了“顶天立地”的理念。“顶天”就是为决策部门服务，“立地”就是立足于实地调查。这一收获，使中心得以在教育部第二次基地评估中成为优秀基地，并于2010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由徐勇教授担任院长，邓大才教授担任执行院长。三是形成了一支专门的调查队伍并体制化。起初的调查者有相当部分是没有受到严格专业训练的志愿者。为了提高调查质量，自2012年起，研究院将原来分别归于各导师名下指导的研究生进行整合，举办“重点基地班”。基地班以提高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为导向，实行开放式教学、阶梯性培养、

自主性管理，形成社会大生产培养模式，改变了过往一个老师带三五个学生的小作坊培养方式。至此，农村调查完全由受到专门调查和学术训练的人员承担，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四是资料数据库得以建立并大大扩展。过往的调查因为是项目式调查，资料难以统一保管和使用。2006年，我们启动了“中国农村数据库建设”。随着“百村观察计划”的正式实施，大量数据需要录入，并收集到许多第一手资料，资料数据库得以迅速扩展。

第三阶段主要是基于历史使命的深度调查（2015年至今）。

农村调查的深入和相应工作的扩展，势必与以行政方式组织科研的现行大学体制产生碰撞。但是，已经有一个良好开端的调查不可停止。适逢中国的智库建设时机，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成为完全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由1970年出生的邓大才教授担任行政负责人。

中国农村研究院独立建制，并不简单是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而是克服体制障碍，进一步改变学术“碎片化”倾向，加强整合，提升调查和研究水平，目标是在高等学校中建设适应国家需要的智库。实现这一目标有五大支撑点：一是大学术，通过以政治学为主，多学科参与，协同研究；二是大服务，继续坚持“顶天立地”的宗旨，全面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争取成为有影响力的决策咨询机构；三是大调查，在原有“百村观察计划”基础上构建内容更加丰富的农村调查体系，争取成为世界农村调查重镇；四是大数据，收集和扩充农村资料和数据，争取成为最为丰富的农村资料数据库；五是大数据平台，将全校、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农村研究学者吸引（并使其参与）到农村研究院的工作中来，争取使这里成为世界性的调查研究平台。这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宏大计划，也标志着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全新起步。

独立建制后的中国农村研究院仍然将农村调查作为自己的基础性工作，且成为有体制性保障的工作。除了“百村观察计划”的持续推进以外，我们重新设计了2015版的农村调查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一主三辅”：“一主”即长期延续并重新设计的“中国农村调查”为主体；“三辅”包括“满铁农村调查”翻译、“俄国农村调查”翻译和我们团队到海外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海外农村调查”，目的是完善农村调查体系，并为中国农村调查提供借鉴。

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和农民成为现代化的起点，并规制着现代化的路径。19世纪后期，处于历史大转变时期的俄国，数千人参与对俄国农村的调查，持续时间长达40多年。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对华扩张中，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依托开展对中国农村的大规模调查，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多年，形成了著名的“满铁调查”。进入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大国，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中国需要也应有能够超越前人的大规模农村调查。“2015版的中国农村调查”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设计的。

“2015版的中国农村调查”超越过往的项目或者机构调查体制，而具有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一是政策目的。智库理所当然要出思想，但“思想”除了源自思考以外，更要源自可供分析的实地调查。过往的调查虽然也是实地调查，但难以对调查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并根据调查提出有预见性的结论。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农村调查有其长处。

“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将非常重视实地调查的可分析性和可预测性，以此提高决策服务成效。二是学术目的。调查主要在于知道“是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是事实的描述。但是，这些事实为什么发生？其中存在什么关联？这是过往调查关注比较少的，以至于大量的调查难以用于进行深度的学术开发，学术研究主要依靠的还是规范方法，实地调查难以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由此会大大制约调查的影响力。“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的深度学术开发性，调查包含着学术目的，并可以通过调查提炼学术思想。其作为一种有实地调查支撑的学术思想也可以间接影响决策。为此，“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在设计时，除了关注“是什么”以外，也特别重视“为什么”，试图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底色及其变迁进行类似于生物学“基因测序”的调查。三是历史传承目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村正在迅速消逝。“留得住乡愁”需要对“乡愁”的记录和保存。20 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中国农民经历了太多的起伏，农村农民的历史构成了国家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因此特别关注历史的传承。

基于以上三个目的，“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由四个部分构成。

其一，口述调查。主要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记录 20 世纪上半期以来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当事人命运的影响。其主体是农民个人。在历史上，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没有历史记载他们的状况与命运。进入 20 世纪以后，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成为“政治人物”，尽管是“小人物”，但他们是历史的折射。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述，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细节，也可以更好地“以史为鉴”。口述史调查关注的是大历史下的个人行为。

其二，家户调查。主要是以家户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家户制度的基本特性及其变迁。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必然有其基本组织制度支撑。但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世界上有成型的农村庄园制、部落制和村社制，而没有了解研究中国自己的农村基本组织制度。受 20 世纪以来的革命和现代化思维的影响，人们对传统一味否定，更忽视对中国农村传统制度的科学研究，以至于我们在否定自己传统的同时引进和借鉴的体制并不一定更为高明，使中国农村变迁还得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回归。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特有的农村基本组织制度，这就是延续上千年的家户制度。家户调查关注的是家户制度的原型及其变迁，目的是了解和寻求影响中国农业社会变迁的基因和特性。

其三，村庄调查。主要是以村庄为单位的调查，了解不同类型的村庄形态及其变迁实态。农村社会是由一个个村庄构成的。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相比，农业文明的社会联系更为丰富，“关系”在中国农村社会形成及其演变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关系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文明多样的大国，关系格局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现，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村庄。国家政策要“因地制宜”，必须了解各个“地”的属性和差异。村庄调查以“关系”为核心，注重分区域的类型调查。通过不同区域的村庄形态和变迁的调查，了解和回答在国家“无为而治”的传统条件下，一个超大的农业社会是如何通过自我治理实现持续运转的；了解和回答在国家深度介入的现代条件下，农业社会是如何反应和变化的。

其四，专题调查。主要是以特定的专题为单位的调查，了解选定的专题领域的状况及其变化。如果说前三类调查是基本调查的话，专题调查则是专门性调查，针对某一个专题领域，从不同角度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以期获得对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全面认识和把握。

“2015 版的中国农村调查”是一项世纪性的大型工程，它是原有基础的延续，也是当下正在从事，更是未来需要长期接续的事业。这一事业已有数千人参与，特别是有若干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当下和未来将有更多的人参与。历史将会记录下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名字将与我们的事业同辉！

2016 年 6 月，教育部公布了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评审结果，我院排名全国第一，并再获优秀。这既是对过往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进一步发展的有力鞭策。为此，本院再次明确自己的目标，这就是建设全球顶级农村调查机构、顶级农村资料数据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术领域和学术风格。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克难攻坚、不懈努力！

徐 勇

2015 年 7 月 15 日初序

2016 年 7 月 15 日补记

凡 例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历来重视农村调查与研究，《中国农村调查·村庄类》是基地新版“中国农村调查”项目的重要成果，在付梓之际，特做以下说明。

1. 根据徐勇教授提出的“中国农村七大区域学说”，即华南区域、长江区域、黄河区域、西南区域、西北区域、东北区域、东南区域，本项目在借鉴日本满铁调查的基础上，按照七大区域的次序，进行村庄形态与实态的调查。这也是整个项目实施所遵循的技术路线。

2. 在村庄调查点的选取上，结合“中国农村七大区域学说”，依据每个区域所辐射的“省、市、县”，一是按照每个地级市两个县、每个县一个村的标准，二是按照典型点与普遍点结合的原则，三是按照“中心与边缘”结合的原则，随机抽样选点。每个村庄一位调查员，在调查之前均受过严格的学术培训，每个村的调查时间为60天以上。

3. 每一篇村庄调查报告分为“村庄由来与形成、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六章，以“传统形态—变迁—当下实态”为主线进行写作。在每篇报告的后面附有调查员的调查小记、调查日记等，以供读者了解整个调查的心路历程。

4. 在报告的写作中，“县名、镇名、村名、人名、部门单位”等均为实名。但是，报告中所出现的照片、人名、数据等信息，均得到了访谈对象或数据提供对象的口头授权或书面授权。另外，档案材料、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历史材料等，在写作中均做了详细的引用批注。

5. 农村传统形态的调查，主要通过老人口述来获取信息、数据；因而报告中的数据可能不甚精确，仅供参考，也请各位读者、学者在引用、使用的过程中，酌情处理。

6. 农村变迁调查会涉及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四清等内容，但是，调查者均怀揣学术研究之心，从农村变迁与发展的历史视角去调查与写作，力求客观、真实地再现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

7. 在出版方面，项目组组建了审稿与编辑小组，严格审查、校审每一篇村庄调查报告，并从中挑选优秀报告，分七大区域，集结成卷出版。

8. 《中国农村调查·村庄类》的重点在于传统形态的调查，是一项抢救历史的学术工

程。由于时间仓促，其中不免有错漏，也希望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提出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中国农村调查》编辑组

2016年12月19日

目 录

总 序 徐 勇/(1)

凡 例 《中国农村调查》编辑部/(1)

村庄类分序 徐 勇/(1)

内分外扩：土楼集居家族的分化与延续——闽南梅林村调查

第一章 梅林村魏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3)

第一节 魏姓的由来与变迁 (3)

一 出自姬姓，以国为氏 (3)

二 源自半姓 (4)

三 由改姓而来 (4)

四 出自少数民族 (4)

第二节 梅林魏氏的开基与繁衍 (4)

一 躲避战乱：由定入靖 (4)

二 修屋建祠：繁衍生息 (5)

三 聚房而居：宗族分化 (6)

四 枝繁叶茂：迁居外地 (8)

第三节 村名的由来 (9)

一 因梅得名 (9)

二 因地定名 (10)

第四节 梅林村的建制沿革 (12)

第五节 梅林村当下概况 (13)

一 人口与姓氏 (13)

二 种植与收入 (14)

三 建设与发展 (15)

第二章 梅林村的自然形态与实态 (16)

第一节 自然环境 (16)

一	气候与灾害	(16)
二	土地与水源	(17)
三	区位与交通	(19)
第二节	人文环境	(21)
一	改造风水	(21)
二	建庙敬神	(22)
三	聚楼而居	(22)
第三节	村落格局	(23)
一	高山围村庄,民居围良田	(24)
二	错落有致,界限分明	(24)
第四节	梅林村自然变迁与实态	(25)
一	居住与分布	(25)
二	交通与宗族	(27)
第三章	梅林村魏氏宗族的经济形态与实态	(30)
第一节	经济形态概况	(30)
一	经济起步:垦荒与农耕	(30)
二	经济繁荣:以商补农	(31)
三	经济衰落:战争与瘟疫	(33)
第二节	产权	(34)
一	宗族共同产权	(34)
二	家庭私有产权	(44)
第三节	经营	(47)
一	公有产权财产的经营	(47)
二	家庭私有产权的经营	(50)
三	合作经营	(51)
第四节	交换	(53)
一	梅林圩概况	(54)
二	圩市交换	(56)
第五节	分配	(57)
一	族内分配	(57)
二	家庭经营成果的分配	(60)
三	国家赋税劳役的分配	(62)
第六节	消费	(62)
一	宗族型消费	(63)
二	家庭型消费	(66)

第七节 财产继承	(67)
一 宗族公产的继承	(67)
二 家庭财产的继承	(69)
第八节 梅林村经济变迁	(71)
一 宗族共有产权的解体	(72)
二 家庭经济的变迁	(73)
第十节 梅林村经济实态	(74)
一 宗族共有产权的管理	(74)
二 交换与商品经济概况	(77)
三 地下六合彩盛行	(78)
四 务工经济与土地流转	(79)
第四章 梅林村魏氏宗族的社会形态与实态	(80)
第一节 社会形态概况	(80)
一 村庄姓氏	(80)
二 世系繁衍	(81)
第二节 社会结构	(81)
一 人口关系	(81)
二 婚姻关系	(84)
三 家庭关系	(86)
第三节 社会组织	(88)
一 谷会	(88)
二 孝友会	(89)
三 房长会	(89)
四 文娱剧团	(90)
第四节 社会交往	(91)
一 族内交往	(91)
二 族际交往	(94)
第五节 社会分化	(95)
一 血缘分化	(95)
二 财富分化	(96)
三 职业的分化	(98)
第六节 社会冲突	(99)
一 宗族外部冲突	(99)
二 宗族房派竞争	(101)
三 家庭内外矛盾	(102)

第七节 社会保障	(104)
一 救济奖励	(104)
二 族内保护	(104)
第八节 梅林村社会变迁	(105)
一 宗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被瓦解	(105)
二 宗族共同体的生产、生活形态被打破	(106)
三 村庄新格局的形成	(106)
第九节 梅林村社会实态	(107)
一 社会构成	(107)
二 社会组织	(107)
三 社会交往	(111)
四 社会分化	(112)
第五章 梅林村魏氏宗族的文化形态与实态	(114)
第一节 文化信仰	(114)
一 祖先崇拜	(114)
二 生育崇拜	(117)
三 神灵崇拜	(119)
四 风水崇拜	(120)
第二节 思想观念	(122)
一 遵守妇道	(122)
二 尊卑有序	(122)
第三节 文化教育	(123)
一 祖训蒙化	(123)
二 敬教重才	(124)
第四节 习俗	(126)
一 结婚习俗	(126)
二 丧葬习俗	(128)
三 节日习俗	(130)
第五节 文化娱乐	(133)
一 攻炮城	(133)
二 妈祖节	(133)
三 唱山歌	(136)
第六节 梅林村文化变迁	(137)
一 解放初期：宗族文化的消逝	(137)
二 改革开放：宗族文化的复兴	(137)

第七节 梅林村文化实态·····	(140)
一 祭祀与添丁·····	(140)
二 族谱与入谱·····	(140)
三 香火进祠堂·····	(141)
四 文娱现状·····	(141)
五 拜神现状·····	(142)
六 教育概况·····	(143)
第六章 梅林村魏氏宗族的治理形态与实态·····	(145)
第一节 治理形态概况·····	(145)
一 梅林村政权建设概况·····	(145)
二 魏氏宗族治理概况·····	(146)
第二节 治理主体·····	(147)
一 族长与士大人·····	(147)
二 小家长与大家长·····	(148)
三 士绅·····	(149)
四 保长与甲长·····	(149)
第三节 治理内容·····	(149)
一 宗族共同事务·····	(150)
二 两大房房内事务·····	(151)
三 家庭事务·····	(152)
三 国家事务·····	(154)
第四节 治理规则·····	(154)
一 族规·····	(155)
二 祖训·····	(156)
三 国法·····	(157)
第五节 治理过程·····	(158)
一 族内事务的决策·····	(158)
二 管理过程·····	(159)
三 参与过程·····	(160)
四 监督过程·····	(161)
第六节 治理方式·····	(161)
一 劝说教育·····	(162)
二 惩罚警示·····	(162)
三 奖励激励·····	(163)
第七节 梅林村治理变迁·····	(165)